



1963年,许政扬先生摄于天津水上公园。

今年是家父许政扬的百年诞辰,他离开我们已将近六十年。父亲离开那年我13岁,妹妹8岁。如今我已年逾古稀,对父亲的记忆永远定格在童年时代。

一

在诸多学者的描述中,父亲是一个严肃孤傲的学究。而在我们的记忆中,他是一个多才多艺、充满生活情趣的人,是为我们的启蒙倾注了无限心血和智慧的慈父。

父亲喜欢画画,他给母亲、妹妹,以及华粹深伯伯都画过肖像。小时候教我画画时,他常会画上一两幅,如果满意就镶入镜框挂上一阵。有一次他临了一幅宋人朱惟德的《江亭揽胜图》,因为古画是绢本,呈淡棕色,所以用了牛皮纸。画好后,他将牛皮纸剪成圆形,镶入镜框,挂在书房墙上。华伯伯来访时看到,吃惊地问:你怎么舍得将《宋人画册》拆了?父亲不无得意地说:你再仔细看看。华伯伯端详了半天,发现是以假乱真,于是就让父亲再临一幅给他。

父亲的手很巧,做过很多手工艺品,泥塑、核雕、木雕、塑编等。胶泥是从我家附近小河边取的,掺入一些剪碎的麻刀和匀,捏成泥人和各种小动物状,晾干后再勾勒着色。现在家里还保留着泥塑的一只小花猪和一只黑猫,历经半个多世纪,仍然俏皮可爱。1960年代,女孩子多用塑料头绳扎小辫,父亲则用它编了很多小玩意儿,如绿色的青蛙和蚂蚱,红白两色的金鱼;蚂蚱的腿是用铁丝弯折的,翅膀用的是较宽的塑料带;最漂亮的是跳芭蕾舞的女孩,粉红色的裙子,单腿独立的经典造型。这些小玩意儿做得栩栩如生,人见人爱,有很多亲朋索要。

父亲还为我们的演出做过道具。二年级时的“六一”儿童节,班上排演了一出儿童剧,大意是:一只小公鸡捡到一个鸡蛋,谎称是自己下的,养鸡的大妈告诉大家,公鸡是不会生蛋的,并教育孩子们不能说谎。演出需要的鸡蛋是用胶泥捏成的,晾干后刷上白粉,约有十几个,装在一个小竹篮里。公鸡和母鸡的头饰比较难做,先得把旧报纸捣成纸浆,糊在一个大小适中的碗上做成半圆形头套;阴干之后糊上一层白纸,用彩笔画上眼睛、嘴巴;在顶部开一道口子,插上用硬纸剪成并贴上红色的鸡冠;再在半圆形的下缘打两个孔,穿上丝带,就可系在脖颈下了。戴着父亲做的头饰参加儿童节的演出,我心里充满自豪感。

父亲留给我们的另一个记忆是儿时的启蒙教育。背唐诗是幼儿园时的功课,对此我已没有什么印象,倒是记得妹妹4岁时已能背诵数十首。应该是小学三年级时,为了让我尽快掌握常用成语,父亲做了一副成语扑克。他把四字成语拆分为两部分,分别写到不同的牌上;每张牌上有4个字,即两个成语的各一部分。扑克是用灰色卡片纸做的,有50余张。玩的时候,凡碰到对方所出牌上的字与自己手中的牌能够凑成一个成语,即可出牌,谁先将手中的牌出光就算赢了。一开始我总是输,很快地,偶尔也能赢一两次;短短几个月时间,我已将100多个成语记得滚瓜烂熟了。五年级时,父亲以《古文观止》作为教材,要我每周背一篇。每个星期日的早饭后,父亲将当天要背的文章大意讲授一遍,然后让我诵读,直至可以背诵。

突如其来的“文革”摧毁了我们的幸福生活。父亲的死讯我是在学校里得知的,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记得父亲离开的前一天,曾对我说:“爸爸是反革命,对不起你们;妈妈没有问题,你们和妈妈……”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话。那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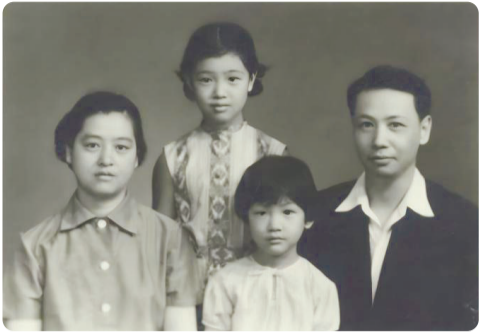


佳趣图(中国画) 陈元龙

学者风骨 慈父情怀

——怀念我的父亲许政扬

许 瑾



1963年,许政扬先生夫妇与两个女儿摄于上海。

此中含义,只是隐隐感觉有些异样。年少之时,我曾一度对父亲的选择不甚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在他看似无情的抉择中饱含着对家人的爱,他天真地希望,他的离去能够使妻女摆脱厄运,可惜他想错了。

二

1952年,父亲从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为中文系和历史系开设过的课程主要有:中国文学史、宋元文学史、元曲语释等。

宁宗一先生曾描绘当年父亲讲课的丰采:“四周的课让我们三四个年级的同学充分领略了许师的博学多才和个性魅力。这是一种崭新的感觉,讲课时舒缓的语气中具有颇强的节奏感;用词用字和论析充满了书卷气;逻辑性极强,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枝蔓和影响主要论点的话;板书更极有特色,一色的瘦金体,字体修长,笔姿硬硬挺挺,竖着写,从右到左,近看远看都是一黑板漂亮的书法。如果说这是‘形式’的话,那么他的讲授内容更令我们感到深刻和精辟。比如在讲《西厢记》时,首先是顺向考察,这样我们就把握了王(实甫)剧创造性改编的关键。而在横向比较中,许师从俄译本直接引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话:‘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这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使我对《西厢记》爱情和婚姻的意义有了一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感觉。”

父亲的同窗挚友周汝昌先生特别称赞他的博学 and 考证功力,甚至说“他博极宋元两代一切典籍,精于诗词词语的考释,当世无可比者”“政扬这样的学人,在我们这一代说来乃是难得多见的极其宝贵的人才,一旦充分发挥了他的作用,在我们的学术史上将会焕发出异样的光彩,可惜他却过早地离去了。在他之后,我还没有看到同一学域中有足以与之媲美的青年学人出现”。吴小如先生归纳父亲的研究特点说:“政扬治学的路数堪称嘉朴学传统,从考证每一个字词、每一名物制度、每一具体问题入手,虽极细小的环节也不肯轻易放过……但政扬的功力却并不停留在考证上,他每讲一文,每举一事,必做到史论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并重。如果用清儒的话说,他是力求考据、义理、辞章三者统一,而不偏重或偏废的。”吴先生还说,“若政扬不死,且年逾古稀,则当世治宋元小说戏曲者,舍政扬其谁!若政扬不死,则目前学术界虚夸轮廓之风,或可稍得匡正纠弹而略减浮躁空疏之弊”。

“文革”甫一结束,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程毅中先生就着手筹划出版父亲的文集,可惜父亲已刊之作只有寥寥数篇。所幸周汝昌先生提供了当年两人合作的《水浒传》简注;周祖撰先生寄来了父亲燕京大学研究

生毕业论文的部分残稿;而黄克先生悉心整理的父亲讲授《元曲语释》的听课笔记,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父亲的课不仅传授知识,更着重于引导学生“碰到难解的词义,有哪些求解之路可寻”。在众多友人的倾力支持下,《许政扬文存》终于在1984年得以面世。

三

2015年家父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在宁宗一先生的精心筹备下,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南开大学文学院、历史学院联合召开了“纪念许政扬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暨《许政扬文存(增订本)》发布会”,家父的师弟、86岁高龄的程毅中先生,父亲的学生以及很多学生的学生参加了纪念会。

程毅中先生回顾了当年与父亲的同窗之谊,并且说“许先生学识广博,而且学术非常严谨,他的每一个问题都是用大量的文献资料来做疏证”“他并不是一个专攻考据的学者,然而继承并发扬了清代以来不断有所发展的优良学风,做到了‘例不十,法不立’……许先生留下的文章不多,他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知识,在方法上也给我们很多启发”。

宁宗一先生说:“在近半个世纪的日子里,许先生高贵的形象始终活在我们这些敬爱先生的朋友及学生心中,他的著作也是我们反复阅读最多的经典。他的研究真正把考据、理论、文采熔为一炉,他的小说、戏曲互相参定、同步研究的方略,更是为1979年中文系成立戏曲小说研究室奠定了研究策略的基石。”

一些上世纪50年代求学于南开的学生回忆了家父的课带给他们的精神享受与艺术启迪:“我们这些同学都觉得听许先生的课简直就是一场非常生动、非常美好的精神文化享受。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他不仅是给了你知识,通过他的课还教你怎么样做学问,怎么样进行学术研究。”

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很多校友表示:许先生是南开中文系永远的骄傲,也是中文系有良知的师生心中永远的痛。许先生的学问、人格永远是我们的楷模;许先生的一生是有修养、有气节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典的一生,做到了为学术而生,为学术而死,这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人格的最高境界。

纪念会的后半,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先生向与会者赠送新出版的《许政扬文存(增订本)》,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刘国辉先生则赠送了《古今小说》校注本。他们分别发言,盛赞家父学问之精深。

刘国辉先生说:许先生注释的《古今小说》可谓经典中的经典,自许注《古今小说》出版,人文社再未出过新的注释本,因为后来者难以超越。从1958年至今(2016年),许注《古今小说》共印刷了170余万册,滋养了千万的读者,虽然许先生只留下了一本“文存”,一个《古今小说》的注释本,但是以少胜多胜许多许。顾青先生也说:许政扬先生的学问是真正的学问,是能够流传千古的学问。数量不说任何问题,质量才是真正能够传世的东西。中华书局看待学术著作的价值是重印、再版了没有?重印和再版了多少次、多少年?许先生的书值得重印,值得再版。非常高兴,这次再版增加了很多精美的照片,最让我感动的是那几个小玩具(指家父所做的泥塑、木雕、塑编等手工艺品),对于许政扬先生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来说,他留下的每一件东西,不一定是文字,不一定是纸,像这类东西都应该存下来。我们能想见其人,能够想象他当时的生存状况,这对于我们认识一个学者非常有用。

我第一次阅读父亲的论著,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许政扬文存》的出版誊录他的遗作之时。当时我最深刻的感触是,父亲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今天重读“文存”我仍有同感,父亲令我钦佩的不仅是他著述考证翔实、立论精妙、见识超前,更在于他的全部论著都经得起历史的筛选。其中或有并非尽善尽美之处,但却没有当年那种简单化、庸俗化的生活活剧,没有拉大旗作虎皮的装腔作势,更绝无趋时媚俗之作。这正是一个学者最可宝贵的风骨与品质。

生命虽然短暂,学术精神永存。亲爱的父亲,永远是我心中的楷模!

他的《无题》《锦瑟》,但是他用跳跃式的手法,从现在写到将来,又将从将来写到对过去的回忆,确实是一种新颖的写法。用现在的说法是“意识流”在唐诗中的运用。这种写作方式在唐代是不多见的。

金章和

再看《全唐诗》中收录的罗隐的一首诗《赠云英》: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常见的唐诗,无论叙事还是抒情都是正面直白的,而且用词都极严谨,而罗隐的这首诗既感叹自己屡试不第,一事无成,又嘲讽云英的境遇。诗中没有写出云英是怎样嘲讽罗隐的,却可以想见罗隐是被激怒了,说出“俱是不如人”,不难看出应是云英先有不当之言在先的。

唐诗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叙事、有抒情,也有一些是嘲讽和奚落的。这类诗歌表现了唐代的社会现实,帮助后人更全面地了解那个时代。

两首有意思的唐诗

很多唐诗读起来耐人寻味。有的胜在语言典雅、格律使用准确,符合中国诗歌的教化作用;有的则是写法新奇、独树一帜;为后人开拓了一种全新的意境;还有的直抒胸臆,嬉笑嘲讽也不避讳。 先看李商隐的《夜语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从诗中可看出李商隐在外面漂泊已久,在故乡的妻子很是惦念,于是修书询问他何时才能回家。李商隐是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当时巴山(有人说是缙云山)时值秋季,四川多大雨,暴雨过后的江水猛涨,河湖也因水大而不宜行船,一时难以启程。李商隐怕妻子担忧,于是安慰妻子,等我回家以后,咱们在西屋窗下点着蜡烛,我再慢慢给你讲暴雨中发生的一切吧。

从字面上看,李商隐这首诗对后代的影响远远比不上

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事(七)

学海堂前传薪火

章用秀

坐落在天津旧城鼓楼南西侧的问津书院,是清代津门六座书院中最负盛名的一座,其规模和影响在三取、辅仁、会文、稽古、集贤等几大书院中名列榜首,它的兴建沿革颇能体现古代天津的书香文脉。

关于问津书院的始建时间,文献中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747年,如《天津政俗沿革记》所载:“乾隆十二年长芦商人查为义呈输城内鼓楼南度宅地址,运使卢见曾捐资建作书院,造屋五十九间。”另一种说法是1751年,如《重修天津府志》所载:“乾隆十六年长芦盐商查为义施地,盐运使卢见曾建屋五十九间。”《重修天津府志》的依据是卢见曾撰写的《问津书院碑记》。因卢是修建书院的当事者,他所提供的情況不可能不准,故笔者以为,问津书院的始建时间以清乾隆十六年较为可靠。卢见曾为官盐运使,又是位学者,爱才好客,交往名士甚多,他认为天津乃“百川朝宗之地”,而书院“阙焉未兴”,很想在天建一书院,只是苦于无地。急公好义的水西庄查氏三兄弟

沽上丛话

沽上丛话

第五三八七期

1939年冬天,在晋察冀边区唐县,一位加拿大医生倒在了太行山的山脚下。在今天,中国人民依然记得他,知道他的故事。

他的名字叫诺尔曼·白求恩。

1938年1月,白求恩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横跨半个地球,投身战火之中的中国抗日前线。在晋察冀的山谷里,他用简陋的器械实施手术,推广前线输血体系,培训战地医护人员。他是医生,更似战士。战火无法遏制他的信念,恶劣的条件也未曾使他退却。1939年10月下旬,他在涞源县孙家庄抢救伤员期间,手指被割伤,几天后在做手术时伤口感染,继发性出血,于11月12日逝世,年仅49岁。他未曾开过一枪,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上最令人敬重的战士之一。

白求恩的生命止步于战壕,但他的精神在两片大陆之间留下深深的烙印。

2025年7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来到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的格雷文赫斯特市,这里距多伦多约两小时车程,有着典型的安省乡村景观:木屋、松林、湖泊,空气中带着湿润的青草气息。在小镇林地深处,有一片湖光山色环绕的宁静之地——白求恩故居。故居位于一条僻静的居民路尽头,是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二层木屋,白色木板墙面配以绿色窗框,屋檐低矮,门前有一条碎石铺就的小路。夏季午后的阳光透过枫树叶洒在门廊台阶上,斑驳陆离,恍若梦境。故居门口的草坪上矗立着中英文的介绍牌,门厅中立着一尊白求恩的铜像:他身着战地制服,神情坚定,眼神仿佛穿越时空,依旧凝望着那片遥远的战地山川。

进入屋内,木地板因年代久远,踏上去会微微作响。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手术床的复制品,旁边陈列着白求恩在中国使用过的止血钳、注射器、绷带罐等战地医疗器械,器具较为简陋,许多边缘已明显磨损。一面展示墙上,挂着一封他用英文夹杂中文书写的信,信纸已经泛黄,其中一行写着:“The Chinese people are brave, resilient, and worth every drop of effort.”(中国人民勇敢、坚韧,值得我倾尽所有努力。)

墙上还挂着几张珍贵的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是白求恩在中国战地帐篷里为伤员做手术的场景,背景模糊,但穿越几十年的时光依然能看得出来,他神情沉着、专注,周围士兵的目光中充满信任。在另一张合影中,他与一群中国小学生站在一起,微笑着低头看着孩子写字。

白求恩故居的讲解员是位年长的义工,在介绍白求恩生平时,她说:“他在加拿大不是最出名的医生,但他是最有信仰的人。”白求恩出身于一个鼓励孩子“到需要你的地方去”的行医世家,祖父是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创始成员之一。高中毕业后白求恩就到了边远的伐木营当“工人教师”,给工人上课,目睹了北美劳工阶层的贫困和医疗资源的极度匮乏。他在大学攻读医学专业时,常常利用假期到偏远小镇义诊。一战期间,他在加拿大第二战地医疗救护团服役,作为担架员奔赴法军前线。1935年,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6年赴西班牙加入反法西斯战争阵营,在那里开创了“前线输血系统”,挽救了大批士兵的生命。1938年,他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支援抗战,他认为:“中国的抗战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线,是人类良知的最后防线。”他不仅亲赴延安夜以继日地为伤员做手术,还推广输血技术,培训医护人员,编写简明的医疗教材,并组织“白求恩医疗队”深入前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说,白求恩的一生都在践行他演讲中说的那句话:“我不能袖手旁观。世界在燃烧,我必须选择战斗的一边!”

正是这份信念支撑着他越过了大半个地球,在太行山脚下搭起了战地手术台,用精湛的医术救治扶伤,彰显了跨越国界的国际主义之光。当我向讲解员提到我是从中国来此参观时,她微笑着说:“是的,他是个不被遗忘的人。”

在加拿大,白求恩的名字也被铭刻进国家记忆之中。他是加拿大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毛泽东专文高度评价的人物,也是少数几位在中加两国都被广泛纪念的非政治人物之一。他的名字出现在安省高中历史课本中,其故居也被写入加拿大国家遗产局的推荐参观路线。他的故乡格雷文赫斯

特镇设立了“白求恩日”,每年都会举办纪念活动;多伦多和渥太华的部分医院还以他的名字命名奖项或医学讲堂。

参观白求恩故居之余,通过阅读文献和走访华人社区,加拿大华人参与抗战的历史烟云,也进入我的视野。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加拿大的华人社区就持续组织募捐、游行与宣传活动,以唐人街为核心建立了广泛的支援网络。温哥华、维多利亚、多伦多等地的中华会馆、同乡

杨一丹

探访白求恩故居



会、妇女联合会等纷纷发起“保家卫国义捐”,将筹得款项分批汇往延安、重庆及国际红十字会。彼时加拿大最大的中文报纸《大汉公报》特设有“前线快讯”专栏,每日更新中国战况,号召加拿大华人与同胞“血脉相连,休戚与共”。

1940年代,数十位加籍华人志愿前往中国,加入“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他们大多牺牲于滇缅边境的上空。今天,在温哥华唐人街的纪念碑坊,卑诗省的华人纪念馆里,仍可看到他们的旧军服、飞行日志、捐款人铜牌、战地担架……这些静物的背后,是血脉所系的历史映照。

白求恩故居的讲解员告诉我,每天都有访客前来参观,其中大部分是华人华侨。他们往往带着孩子,从多伦多、渥太华甚至温哥华驱车数小时前来,只为在白求恩铜像前拍一张合影,讲一句“他是我们祖国的英雄”。人们在白求恩铜像前献上的朵朵鲜花汇聚成一道历史的暖流,提醒着后人:正义与牺牲不曾因时光褪色,爱好和平的世人从未忘记。

题图①为白求恩故居内的白求恩铜像。

题图②为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市白求恩故居外景。

满庭芳